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晚

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

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

周明初 著



東方出版社

周明初 著

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

東方出版社



◎ 学术文库

中国文联出版社

责任编辑:喻 阳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周明初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8

(日晷文库丛书/吴先宁主编)

ISBN 7-5060-0881-5

I. 晚…

II. 周…

III. 文学家-心理-文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I206.2

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

WANMING SHIREN XINTAI JI WENXUE GEAN

周明初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204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 7-5060-0881-5/I·74 定价:16.50元

总序

东方出版社与吴先宁同志共同合作，经周密考虑与多方联系，约集近数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组织出版一套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著作，第一批共十二种，起名为《日晷文库》。我觉得这一丛书的名称很有特色，它不但是比喻中华古典文学还如日行天，灿烂辉煌，照耀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祖国大地，而且象征我们这一代年轻的研究群体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全身心地投入这一蓬勃向上的精神领域，努力开创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学术天地。

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这是本世纪前80年所未曾有过的。所谓转型，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对古代文学由单纯的价值判断而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的设施而向客观历史的回归。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在观念上的一大跃进。前几年在学术界曾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可惜口号虽然提出，讨论并未具体展开。但我们的研究实践却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文学史的研究，应当注意史的发展线索，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简单排列的一个个作家，而是连续不断向前推进的不同时段。这就不是作家评论的程序汇编，而是文学群体的有机活动系列，包括作家之间的关系（如新老作家的交替，文人集团的友谊与冲突），作家群体的形成与消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衰落，创作风格的变化，不同文体的代兴。这之中，

群体与时段的研究,是这些年来最出色的成绩。有谁在这方面下了工夫,他的著作就能使人耳目一新。因为即使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也不是孤立的人,在他的周围,有一个流动着的文学环境,有一个层次不等的群体,即使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也是属于同时同地的艺术家族的。

这种趋向,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特别是在年轻研究者中,已经形成一种冲力,那就是要从过去占很大优势的局部、个体研究中挣脱出来,对文学的长时期发展阶段作出整体的把握,在这种把握中表明研究者的力度与深度,反映这一代学人所特有的对文学命运的关切与忧思。

转型期的另一表现,就是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古代文学研究要向深度发掘,当然要着力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探求,但这种探求是不能孤立进行的。这些年来,文学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以及与宗教、教育、艺术、民俗等关系,已被人们逐渐重视。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正如 19 世纪法国文艺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当然,我们这样做,不仅要考虑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更要探索文学在总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怎样显示其特色。它不是使文学隐没,而应是使文学作为主体更加突出。

这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如果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真正有所进展的话,那么,这种文化意识的观念及其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的运用,是最可值得称道的成就。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进行一些探讨,那么这个文化意识问题就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新的课题。

我觉得,从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新格局和新思路来看这套丛书,可以说现在这十二种著作正是从总体上体现这一时代的学术风貌与年轻一代的创新气度。这十二种书,从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开始,一直至明清时期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都是从思潮、流派、群体出发,有意识地对文学史的线索进行清理,重在清理事实,而不简单地品评高下,不单纯立足于点的深化,而在于线的连续;与此同时,又善于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恰当的中介环节,使我们接触到那一时代、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

自80年代中期起,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为数不少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培养出来和成长起来,这已构成我们今天古典文学界的一代研究者,他们无论从治学道路、理论观念,以及精神气质、学术兴趣等方面,都表现出与80年代以前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已日益显露出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和学术品格。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对传统研究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对现状的研究,而现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这十余年来这一研究生群体的研究,研究他们和他们的著作,与研究古典作品本身有同样的意义,同样的价值。特别是这90年代以来的一批博士研究生,他们之中不少人更注意广泛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独到的研究视野和观念,而另一方面又努力对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文学史料作沉潜的研索,这种勤奋的实证训练是足以支撑他们作大幅度的理论探索的。当然,在这之中,需要对现实社会中的市场冲激与贫富差距有理性认识,要有左思《咏史》诗中所说的“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的心理准备。我想,这十二种著作产生的本身,就足以表明我们这一代年轻学人为学术而奉献的文化素质。

这套丛书的总序应由丛书主编吴先宁同志来写的，我推辞再三，但吴先宁同志与东方出版社还是希望我借此谈谈对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与前景的看法。吴先宁同志是曹道衡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编委中傅刚同志的博士导师也是曹道衡先生，而曹先生则是我的学术至交。编委中的钱志熙同志，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我都分别在杭大和北大参预评议。过常宝同志关于楚辞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我应聂石樵先生之邀到北师大去主持答辩的。黄仕忠同志虽在中山大学，但与我早有文字交往。我很感谢他，我在1962年所考的关于《琵琶记》作者高则诚卒于明朝立国之前一说（《文史》第一辑《高明的卒年》），得到他的赞同并给予进一步的补充论证。因此可以说，我有缘与这几位年轻博士生有学术交情，因此也就不自量力，为这套将能受到读书界注意和欢迎的《日晷文库》撰写此篇小序，谨请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傅璇琮

1997年3月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学术编辑委员会

- 学术指导 聂石樵
 钱仲联
 章培恒
 曹道衡
 傅璇琮
 (按姓氏笔划排列)

● 主 编 吴先宁

● 编 委 方 鸣
 傅 刚
 过常宝
 钱志熙
 黄仕忠
 孙 涵


 学术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

本书着重研究处于晚明这一历史转型时期作为时代精英的士人的心态变化，认为士人心态的变化与晚明时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士人心态长期发展演化的结果。晚明士人就其群体而言，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心理趋向，就是力求道统与政统合一的理想人格的解体，自我的觉醒和个性的张扬；而就其个体而言，则每个士人的个性不同，他们的心态也很不同。本书在进行群体心态探讨的同时，对晚明时在文学或思想上富有建树的四位代表性士人的心态，也作了个案分析。



中国学术文库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书 目

诗经的文化精神

楚辞与原始宗教

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

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

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

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

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

宋明之际的社会心理与小说

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

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

清代文化与浙派诗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

目 录

第一章 晚明士人心态变化的时代背景	1
一 政治的腐坏	2
二 时尚的变迁	12
三 哲学的突破	28
四 士心的嬗变	43
 第二章 高居庙堂的士人和士人心态	60
一 弼谐无闻,循默避事	
—— 阁臣的依阿心态	61
二 忠厚意薄,銜沽情胜	
—— 谏臣的微名心态	74
三 廷论纷呶,物议横生	
—— 党争和党人心态	90
四 名丽阉党,依媚取容	
—— 士人的人格湮灭	105
五 生以理全,死与义合	
—— 道义承担者的求仁心态	120
 第三章 远处江湖的士人和士人心态	136
一 从儒士到名士和隐士	136

二	士人心态的外现性	164
三	士人心态的内在性	188
第四章	士人心态的文学个案	206
一	徐渭:自我的挣扎	206
二	李贽:激情与谵妄	223
三	汤显祖:情与理的冲突	237
四	袁宏道:适意与避世	251
	主要参考书目	265

第一章 晚明士人心态变化的时代背景

我们研究晚明士人心态，首先面临着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晚明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它的划分依据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晚明就不是一个确切的时间概念。一般学术界把万历到明代灭亡前这一段时期看成是晚明时期。但是，晚明是不是就从万历元年开始，万历之前的某段时期，如隆庆时期和嘉靖后期算不算晚明时期？谁也不能作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因此，所谓晚明又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时间概念，它没有明确的时间断限。

但是，我们既然要研究晚明士人心态，总得有个大致的时间断限。尽管不确切，总算能够说得过去，那样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才能心中大致有数。我们就把万历到天启年间这样一段时期作为晚明的主体时期，把嘉靖后期作为晚明时期的上限，把崇祯时期作为晚明的下限。而这上下限依然是不明确的。

公元 1572 年，也即隆庆六年的五月，36 岁的明穆宗朱载堉因中风而在宫中去世了，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在灵柩前继位，登上了皇帝宝座，下诏改第二年即 1573 年为万历元年，是为明神宗，从此开始了明代历史上长达 48 年的腐朽统治。明神宗之后是泰昌帝明光宗（光宗在位只有一个月，还来不及启用新年号，大臣们便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为泰昌元年）和天启帝明熹宗，这两

朝总共只有七年时期。从万历到天启的半个世纪的时间,无论是在明代历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都是一个转折点。就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来说,万历以前也即 16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只是到了万历时期及其以后,才被日益勃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赶上并超过了。就明代历史来说,万历年间是明王朝经过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守成局面之后,彻底走向衰落、腐朽和灭亡的时期。以万历年间为主的晚明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还是在思想、哲学和文学诸方面,都发生着非常显著的变化。社会历史进入了一个大变动时期,这是一个动荡与繁荣、死亡与新生并存又先后交替的历史时期。处于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作为社会精英的明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确切地说应该称为明代的士人,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来,古代的士大夫阶层与现代意义上的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毕竟是有区别的。这一章中,我们试图探讨政治局势、社会风尚、哲学思想等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变化和士人心态本身的发展变化对晚明士人心态的演变所产生的影响。由于这些方面的变化都是一个长期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因此在探讨这些变化时,我们常常得回溯到晚明之前。

一 政治的腐坏

万历年,从 1573 年到 1620 年,共 48 年,在有明一代就数这一朝最长。这一朝又可分为三期。万历前十年,朝廷大权掌握在首辅张居正的手里。他的后面有万历帝的生母慈圣李太后撑腰,司礼太监冯保也支持他,小皇帝如同傀儡,从国家大事到御前教育,事事要仰仗首辅张先生。尽管这位皇帝在万历六年(1578)16 岁时举行了大婚,这标志着他已成人,但朝廷大政仍由他的张先生一手操

办,年轻的皇帝只是例行公事般地把张先生等人的“票拟”改用朱笔抄写一遍而已,丝毫不敢有自己的异议和主张。即使在张居正离京归葬父亲的几个月里,万历帝对次辅吕调阳等处理政务不放心,告诫他们“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①张居正有了皇帝的信赖以及慈圣太后和冯保的支持,也就按照自己的意图有声有势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整改。注重实际的张居正的改革措施是从整顿吏治,提高各级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开始的,为此他采用了考成法来考察各级官员的实绩作为官员升降的依据。他还整饬了边防,整顿了学校,清丈了全国的土地,并且在清丈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了将赋役两项合并,折算成银两,由地方官直接征收的一条鞭法。张居正所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效,如整顿吏治之后,行政效率确实提高了,朝廷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②。在军事上由于任用了能干的将领,原来边事久废的局面得以改观,边境多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明代的财政在嘉靖、隆庆时几乎年年亏空,经过张居正整改后,有了积余。

万历十年(1582)的六月,操劳过度的一代权相张居正患病去世了,20岁的万历帝开始了亲政。他威柄自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而且,自从这位皇帝在稍后的几个月里生了皇长子、做了父亲之后,他的母亲慈圣太后也就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万历帝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这时候,原来遭到张居正压制、排斥和打击的官僚们掀起了一场反张倒张的运动,揭发张居正弄权的奏章越来越多,加在张居正头上的罪行也越来越大,有人甚至把张居正形容成企图篡夺帝位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张居正在执政的十年中,锐意进取,勇于任事,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确实开罪了许多人,其中的不少人尽管才智低下,但他们得以任事,是有各种各样复杂而

①②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微妙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势力的，这些人通过亲缘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同年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其实联结着许多人，他们只是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上的一个网眼，触动了其中的一个也就触动了一大片。加上张居正作风专断，任用私人，对不肯依附于他和反对他的人毫不容情地加以排斥，造成了更多的对立面。特别是在他的父亲死后，对反对夺情、要求他守制丁忧的官员的残酷打击和严厉压制，使他更加不得人心。张居正对他的同僚也根本不放在眼里，次辅吕调阳始终不敢与他有所争执，而由张居正引荐入阁的张四维更是“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①他们心里对张居正自然是很不满的。在万历帝刚做皇帝的几年里，由于年纪小，再加上张居正对他的督导又很严厉，他的心里对张先生充满了敬畏。当他稍大，特别是大婚之后，张居正仍把他看作是个孩子，大权依然独揽，对他的管束仍然像以前一样严厉，这时候的万历帝对张居正在敬畏之中已经有怨恨的情绪在慢慢滋长了。等到他亲政之后，尝到了做皇帝的真滋味，再回过头来想想当初做皇帝而要受制于权臣，对张居正只能是怨毒了。所以当张居正死后，反张的各种势力汇集起来，影响着万历帝，激发并增大了他对曾是自己的老师的张居正的恶感，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他终于痛下决心要对张居正进行总清算了。在此之前，曾是大伴的冯保首先被赶出宫廷，发往南京终身软禁。张居正身前死后所得的各种官秩和荣耀被剥夺殆尽，家产被查抄，大儿子因追赃而被逼自杀，弟弟和另外两个儿子被送往远方充军。张居正执政时所任用的大批官员自然被斥逐了，以前被张居正罢黜的官员重新得到起用。而张居正执政时所推行的一系列整改措施被取消或停止了，十年改革的成果随着张居正的被清算而付之东流。

^①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世间已无张居正，也不可能再有张居正。万历帝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制皇帝。而这个紧握大权的专制皇帝，又是骄奢淫逸、昏庸无能的。大明帝国日暮途穷，就像不慎坠入深渊的泥足巨人一样，再也没有一种人为的或自然的力量能把它拉出险境，使它起死回生了，16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留下的只是失败的全纪录。

不能说万历帝从来就是一无是处，因为在他亲政的最初几年里，他也曾励精图治，表现出一种大有作为的势头。突出的表现是万历十三年(1585)五月的那次祈雨活动。北京地区自上年的八月份以来，一直没有降下雨雪，旱象严重。在各个地方官祈雨无效后，万历帝决定亲自祭天祈雨。祈雨那天一大早，皇帝亲率文武百官，一律身穿用黑布镶边的蓝布袍，步出大明门，经过十里路的步行来到南郊的天坛祈雨。繁复而虔诚的祈雨仪式结束后，万历帝不用鸾驾，仍率百官们步行回宫。这次祈雨活动往返步行近20里，再加上天气炎热，对一个平日恃辇而行，从未走过如此长路的皇帝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为了表示祈雨的诚意，往常皇帝出行时所执行的清道措施这次也免除了，老百姓有幸一睹皇上的天颜。当时目睹此事的百官和小民，颂不绝口，以为逢上了尧舜之君。几天后，万历帝在视朝之后又在平台召见了他的辅臣，共商国是。皇帝和他的辅臣之间的召对之典，可是自明孝宗以来废止近百年以后的第一次。

可惜像这样的励精图治的时间实在太短促了，来去匆匆，只有四年。自万历十四年(1586)的下半年开始，万历帝进行了长期的怠政。怠政的方式包括不肯上朝召见大臣、不亲自按时祭享太庙、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批答处理大臣的奏疏等。自万历十七年以后，怠政的情况越来越趋于严重。比如说视朝，万历十七年后除了偶有几次上朝外，大部分时间在宫中深居简出，即使发生了紧急的军事情况，他也无动于衷，对大臣们提出的面见皇上的请求不加理睬。